

高校文科 电大 业大 函大 职大
文学评论教学参考读物

文学评论 十面观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十面观

吴 炫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文学评论的十个方面，对文学评论与读者、生活的关系；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以及文学评论的标准、方法、风格、通俗性和美学魅力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较新的阐述。它有利于开拓学生学习文学评论的视野，提高其文学评论写作的能力和素质。本书已列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写作课的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校文科、业大、函大、职大师生及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文学评论十面观

吴 炫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丹徒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2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10336·005 定价1.00元

责任编辑 张 帆

小 序

刘 锡 庆

在“创作落后于生活，评论又落后于创作”的不绝于耳的怨艾声中，在“繁荣文艺批评，加强文学评论”的颇为动心的召唤声中，他，为人们实实在在地奉献出了这本别致的小书。

这是一本对“文学评论”的写作进行理论探讨的小书。

文学评论，是一门“运动着的美学”，是一门充满了创造活力的“评断”的科学。它和文学创作是孪生姊妹。只要创作方兴未艾，它也就会长青不衰。但它赖以存活的“命脉”，是“美学”，实质是“哲学”的根柢；据以自立的“基石”，是严谨、系统的理论思维。哲学思想的贫困，理论气质的淡薄，是文学评论长时期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原因。

我们太需要哲学的武器了，太需要学术的民主了，太需要批评的自由了，太需要真正“操”马列“枪法”的战士了。

我们期望着自成学派的、个性鲜明的“评论大家”的出现。

这本小书，在“文评”写作的探讨方面，应该说，是一次带有“开辟”性质的努力。虽然，它会有不成熟之处，不妥当之处，但它无疑表现了一个年轻理论工作者的思想锋芒和

探索勇气。

作者吴炫，他原在中央电大任教，对教学，对学生的情况都相当熟悉——因此，这书是会对电大学生的“文评”写作有所助益的。而今，书成人去，他已调到江苏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了。

我们可以相信：继这本小书后，他会向人们奉献更多、也更好的科研成果。

八五年盛夏于北师大

目 次

小序.....	1
一 评论与读者.....	1
二 评论与生活.....	13
三 评论与政治.....	24
四 评论与创作.....	40
五 评论家与作家	60
六 评论的标准.....	77
七 评论的方法.....	90
八 评论的美学魅力	117
九 评论的通俗性和学术性.....	136
十 评论的风格.....	147
小跋	166

一 评论与读者

“评论的真正权威应该是读者。”

这句评论或理论文章中经常引用的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实现。评论家和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产生的差别或截然相反的看法，已不只是当代文学史上才有的现象。也许，总结评论和读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徒劳的做法——评论和读者的关系的确定，永远象一片鸡毛飘浮在空中一样，显得可望而不可即。

挖掘评论和读者的关系显然是令人十分感叹的。对于今天每一个有志于文学评论事业的青年人来说，当他跨进了评论的殿堂的大门的时候，或许会惊奇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他发现自己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以前自己对文学发表的点滴之见，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甚至和身边的众多读者的意见相比，也并不高明或深刻多少；另一方面，当他仰望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茅盾等评论大家的时候，又很担心自己能否攀上那样高的美学险峰。当他徘徊在这种矛盾的情绪中，他有时也会突然醒悟评论的奥妙所在——当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妈妈摇着小货郎鼓“叮咚叮咚”地向她怀里的宝宝的时候，没想到那小宝宝竟然兴奋得手舞足蹈，一双小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那小宝宝是不是在琢磨评论语言呢？”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发现使他激动和羞愧起来。他想躲开这种思考，但是在电影院里，他又听见身旁的一个孩子这样对他的爸爸说：“爸爸，电影上这个老头一

看上去就是坏蛋！”青年人狼狈了。因为孩子道出了他的看法。他离开了电影院。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听到了一个电影评论家提到了他那天所看电影的人物概念化的问题。他的心情更紊乱了，他的眼前闪出在电影院里的孩子和电影评论家的身影。接着，声音出现了：孩子和电影评论家说出了相近的话……

于是，对评论事业的神圣信念有些动摇了。原先他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评论工作的才能的念头也动摇了。对评论诸观念的再认识使他重新陷入了某种思考。他不太轻易发表自己的言论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言论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设身处地地琢磨他人的评论语言，觉得也有某种合理之处。他甚至想，假如对同一篇作品同一个人物，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那倒是十分乏味的了。人们十分相信这样的看法：只有丰富才和繁荣划等号，而一致反而单调。他还发现，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评论的权力应该是人人都享有的，只有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国家，评论才是少数人的工作。他觉得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周围大踏步向文学高峰攀登的青年。也由于这一点，他对文学评论专家的崇拜心理发生了新的变化。他的自信心增强了，他越来越坚信这样的看法：每个人都是而且可以成为评论者或评论家。当生活赋予了一个人全部的内容的时候，要想让他沉默，那就等于不让人喘气一样的难受。

他忽然想到“百家争鸣”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广大关心文学的读者可以心情舒畅地抒发自己由文学这个“灰姑娘”激起的喜怒哀乐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评论和读者真正的关系实现的那一天，那就是评论繁荣的开始。他记得美国批评家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批评和散文》中曾这样说

道：“我希望即将出现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不仅艺术家，而且连总是‘有着健全的艺术见解’的普通人，毫不出众的人，都不怕说出自己的见解来。那时，无论在哪里——在科学、文学、艺术中，只要碰到人为的东西，他都要拒绝，因为在人为的东西里找不到‘朴实，自然，真实’，找不到同生活相似的东西。”（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他觉得豪威尔斯的观点至少在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普通读者评判文学是随时随地的，心情舒畅的，不担心被人戴帽子或打棍子的。餐桌聊天、散步、闲言碎语等，可能就是普通读者发表文学意见的“阵地”，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很亲切，或者更能实现人的生活的价值，实践人和文学的真正的关系——人们既然有随时随地欣赏文学的权力，也就不能缺少随时随地评论文学的权力。

只有专制时代才能扭曲评论和读者的正常关系。这与扼杀人民民主权力是不能须臾分离的。蒋介石干过这个事，“四人帮”也干过这个事。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情况下，我们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及时纠正，只有在文学的新时期才能真正实现。党中央提出的“评论自由”就是最鲜明的标志，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旨在抚慰千万读者对我们刚刚复苏几年的文学评论抱着敬而远之甚至抵牾情绪的伤痛，旨在让各式各样的评论，自由地、心情舒畅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旨在总结三十多年我们文学评论的经验和教训，使文学评论成为读者关心的事业。无疑，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党中央给文学评论园地洒上的催生的露水。

也许这种疑问是很难得到解答的：当读者和评论家对同一部作品产生迥然不同的看法时，真理到底在那一边？简单

地回答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至少包涵这样两个方面：读者评判文学的尺度，评论家评判文学的尺度。当我们仔细考察为什么作家对来自读者中的意见十分欢迎，而对评论家的意见倒是心不在焉时，答案就浮出了水面。在对艺术的“感受”方面，作家和读者更容易达到一致——作家凭艺术感受进行创作，读者凭艺术感受进行鉴赏。读者对于艺术的评判，无疑是感性多于理性，感受多于裁判——当一篇作品使读者的内心感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是不太关心作品“反映”的是什_么？怎样反映的等等。读者对艺术的评判有时也能产生点滴精到的看法，但那多是“感受”的旋风带起的“理性评判”的“石子”。这种“石子”的威力，有时甚至高于评论家们的唠唠叨叨。毋庸置疑，通过艺术感受带来的理性评判，也就更准确，更容易击中作家创作的“弊端”，对这样的评论，作家是欢迎的。此外，至少在这样一点上，作家和读者是相通的——作家从事创作是抒发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苦闷和欢乐的感受，而读者欣赏艺术，是接受这种感受，以弥补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苦闷、失败的痛苦和怅然，在艺术中寻求自己的所不能为，以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来寄托自己当不成“英雄”的“遗憾”。因此，在满足于情感生活的需要这一点上，作家和读者是相似的。读者从来不太关心情感以外的关于作品的评价。由于读者多执着于文学中的情感因素，因此在评论家看来，至少有两点可以判明读者尚不如自己的：第一，由于太关心感受和感情，读者对文学的评判就会夹杂着更多的个人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偏见。这种偏见游离于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因此很难说是符合作品实际的评价；第二，由于执着于感情，读者或许就会忽略了作品反映和揭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就淡化了通过作品认识生活的意义。

因此，读者对文学的评判是低层次的，或者可以说是评论的第一阶段。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命题，或者说第二个困惑。即：文学评论是否能有带着个人感情色彩的见解？个人的见解是否与个人偏见完全划上等号？个人的见解能否达到对作品的深刻认识？个人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见解与评论应该持有的公允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评论家是否能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一下子是很难回答这么多问题的。但这些问题的核心似乎集中在个人见解和个人偏见是否划等号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个人的见解、个人的风格”，评论家和读者都是赞同的，丧失了个性，就无疑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但难题就在于个性和偏见又是经常联系着的。众多的读者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意见的充分发挥，可能也就是各种属于个人的偏见纷纷扬扬出现的时候，把个性和偏见截然分开，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偏见一旦盛行，文学评论也就失去了尺度，失去了真理，失去了心平气和和公允，健康的文艺也就很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把个人的意见和纯属个人偏见的意见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尺度的制定也同样是困难的——怎样的意见是属于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属于个人偏见呢？我们是容易犯这样的眩晕症：当个人意见充分发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或许执着自己的意见，都会把他人的意见看成偏见。因此，这种尺度的制定又必须是广大读者都公认的尺度。即只有在这种公认的尺度的范围内才容许个人意见的存在。如果突破了这种大家都公认的尺度，就属于个人的偏见。但问题又来了，谁来检验这种尺度的实行呢？如果检验尺度的是读者，那么能达到这种尺度的意见又可能是代表大多数读者的

意见，这种能代表大多数读者意见的“个人意见”，即是读者所渴望出现的“真正的评论家”。如果一个评论家的意见和大多数读者的意见相悖，读者便可称之为偏见。

但是普通读者中的偏见怎样衡量呢？这种衡量就是十分麻烦的了。也许，在普通读者中个人的见解和偏见的互相杂揉並不属不正常的情况。评论一旦和广大读者发生了普遍的联系，各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评论抒发，必然掺杂着属于一些偏见的言论。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一些属偏见的言论，不能因为偏见的存在就剥夺了读者评判文学的权力；另一方面，普遍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和审美眼光，就是被读者推崇的“评论家”的义务了。两者的相辅相成，构成了评论的整体。

有没有评论家的言论高于大多数读者的时候呢？如果有的话，尺度又在哪里？当具有高度审美眼光和预见力的评论家预示着某种文学具有光辉的未来的时候，也就是广大普通读者还对这种新文学产生疑问的时候。这种由读者无形中制定的固有“尺度”就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评论家的队伍就产生了分化。一方面，是站在读者方面的评论家，对新的文学能否实施采取挑剔的眼光和怀疑的态度，他们的评论和读者的口径基本一致，因此可能一度时期被读者们推崇；另一方面，和大多数读者意见不一致的评论家又可能受到暂时的冷落。这个时候，恰恰是衡量一个评论家的理论勇气和美学水平的时候，经受住这种考验的评论家，就是有资格引导读者向着辉煌的文学未来前行的评论家，也是有希望成为评论大师的评论家。他的见解，将和广大读者最终达到新的一致。

评论和读者的关系虽然有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但更多

的是若即。这种“即”，还表现在评论的层次性。文学发展到今天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们今天必须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评论观念。评论层次的多样性，评论色彩的丰富性，将是评论发展的未来。评论的这种多层次性和读者的评论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第一级台阶，就没有最高一层台阶。如果视普通读者的评论是第一台阶，评论家的评论便是高一层台阶。只容许“高一层台阶”的存在，无疑就等于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撑竿跳运动员”，在生活中避免低层次。确定评论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就象确立创作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一样，来自千百万读者的关心和实践。我们应确定的方针不是再象过去那样轻易地取缔，而是怎样的倡导。既然一部分文学史告诉我们，有生命力的作品並不都是当时的评论家举荐的，就象《水浒》、《三国演义》那样的被当时的评论家瞧不起一样，只有读者才能使它们流传。因此，来自读者中间的各式各样的成熟的或不成熟的，带有偏见的或不公正的言论，始终不能登上文学刊物的大雅之堂，就是十分令人深思的了。实际上，没有读者中来的各种通俗的评论意见的盛行，就很容易使文学评论本身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容易使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走上“纯研究”，也将取消评论的多层次性，使文学评论缺乏活力。这样，势必使评论和读者再一次拉开距离。这种距离的拉开，很难说文学评论会走向真正的繁荣——评论的真正繁荣，既来自于它的深度，也来自于它的广度。

著名学者罗根泽先生早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说这样的话：“文学是多数人的事业，所以一般人之对于文学，也比较喜欢发表意见。”他把文学批评分为一般的批评和专家的批评两种。他说：“专家的批评，产生于一般的

批评，没有一般的批评，造不成专家的批评。”可谓中肯之见。

评论和读者的关系还在于：读者既是评论的发言者，又是评论的接受者。任何评论的阐释，鉴赏或指导的目的，乃是依赖于读者的“读”才实现，读者不读或不喜欢读（包括作家不读或不喜欢读），评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成为评论家个人的感叹。评论不等于理论。理论和读者的关系永远是间接的，而评论却是和读者、创作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评论的威力和魅力某种意义上乃是经过读者的“再创造”才得以实现。须知评论的发表同文学作品的发表一样，只是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则有赖于广大读者来完成。今天的读者，是拥有自己的头脑的读者，不太可能轻信不高明的评论和理论的引导，没有他们的亲身实践，评论的威力是难以实现的。而评论怎样作用于读者，这正是值得理论家们思考的。

评论和读者的密切关系怎样才能得以很好地保证，这又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沉缅于“评论自由”的思考中，不能不想到思想自由的必要性。显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包括人民民主的充分发挥，包括人民言论的充分抒发，包括人民的心情舒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自由，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人民创造的积极性。人民中不同意见的发表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利害的冲突。因为这些意见多数是建立在对我们社会的弊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和解决的基础上的。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最根本目的，乃是最充分发挥人民的思想独创性和艺术创造力，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是和思想的禁锢及把思想纳入某种“轨道”不能同日而语的。

那么，人民的言论自由能否由法律来保证，人民的评论

自由能否通过文艺法来保证？这种保证乃是旨在区别属于个人的意见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的界限。对属于个人的意见，任何一级组织不应该横加干涉。而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组织和个人又有权利进行批评、教育，甚至批判。严重的，也应该绳之以法。这同样不应该是矛盾的。如果把言论自由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泛滥，显然又是对自由的狭隘理解。约翰·密尔曾在他那著名的《论自由》里说道：“凡认为对欲望和冲动的个人性不应加以鼓励使之展开的人，必认为社会不需要强有力的个性，必认为社会中若含有不少富有性格的人并不见得好，必认为精力方面的一般的高度水平也是无足取的。”因此，能使个性充分发挥的时代，必然是允许言论充分发挥的时代。

评论应该是这样一个具有群众性的事业。问题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评论的繁荣的到来，一些具有影响的辉煌的文学评论巨著的诞生，又离不开一批富有很高的理论素质，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对生活的深刻的认识和发现，对前进的时代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的敏锐感受的文学评论家们。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又只能是少数人才能够成就的艰难的事业。即：“一般的批评”与“专家的批评”毕竟是有差距的。它们的差距形成了评论的层次。一般的批评由于它的群众性，十分正常地掺杂着各种成份而不成系统，而专家的评论便具有在一般的批评基础上的总结、归纳、深化的特点，这是评论与读者关系的统一和对立，也是评论和读者关系的深入。

这种深入的目的还在于，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学史。文学史告诉我们，真正在文学理论和评论上有所建树的评论家，总是寥寥无几。比起一个时期群星灿烂的作家来说是不

言自明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只出现了王充、曹丕、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叶燮、刘熙载、王国维等屈指可数的文艺理论家；一部俄国近代文艺批评史也只出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皮沙列夫等卓有成就的批评家。这是由于，一个伟大的文艺评论家的诞生，从客观因素来说，他比作家更易受时代的制约，受政治的牵制，受环境的影响。在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要想痛痛快快地出现一个理论大师，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多艺术见解，少提出政治和思想见地。而一部理论著作的诞生，需象蚕作茧一样一根一根用丝去织，用“工笔”细心地去描绘，她缺少感情的渲泄，她不能随意暴露和表现自己的灵魂，因此比创作更“难受”。因为作家的观点可以从其作品的情节自然流出，理论家和评论家却需直言不讳。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容易成为社会注意的对象。冯雪峰、胡风、巴人、秦兆阳、陈涌的遭遇就是明证。时代与评论家的这种特定的关系，造成了评论家成长的极其困难的客观因素。另外，从主观上来说，一个文艺评论家在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文艺现象的准确和深刻性上，要比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茅盾早就说过：“我觉得，一位批评家如果对于他所要批评的一篇作品的内容不能比那位作家有更多的理解——换言之，就是批评家所有的生活知识不能比作家更多的话，那他一个不留神就会写出公式主义的批评来。”（《茅盾文艺杂论集》，下册，第108页）而事实上，高于作家的评论家并不多见。此外，评论家要比作家要求不带任何感情的偏爱，他要求具有最大的公正，最广阔的胸怀。莫泊桑曾经在《谈小说》中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批评家，就只应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象绘画的鉴

赏家一样，仅仅欣赏人家请他评论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他那无所不知的理解力，应该把自我消除得相当干净，好让自己发现並赞扬甚至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不喜爱的，而作为一个裁判者必须理解的作品。”要让我们一般的作家和读者，甚至一般的评论者做到这一点，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莫泊桑这样总结说：“大多数批评家只能算得上是一些普通的读者，因而，他们责备我们几乎全责备错了，要不然就是毫无保留、毫无分寸地恭维我们一通。”

一旦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进行一下自我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一些评论者，一些自认为评论工作低于创作的作家或读者，他们一旦发言，便会犯莫泊桑所说的这样的错误。实际上我们说，这大概都不是一些具有一定素质和风度的评论家，他们离真正的文艺评论家的路程还差得甚远。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倡导或理解评论应该是一项群众的事业，但是一个文艺评论繁荣局面的到来，又不是大家七嘴八舌就能成就，而必须是有杰出的，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和反映读者和作家的心声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胸怀宽阔的评论家的出现来决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认为文学评论是一个能令人产生敬佩之情的事业。谁又能断言，在一般的评论者成长为伟大的评论家之间，该洒下多少辛勤努力的汗水呢？

评论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既紧密又不是可以随便成就的。但读者和评论家之间並沒有截然的界限。这就决定了评论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确定评论的群众性，是评论观念探讨中的第一性工作。只有群众性的实现，才能有评论中的个性的实现，才能有评论的感情、评论的色彩、评论的层次，以及评论的生气勃勃，才能派生出评论的